唐宋散文在法国的翻译与研究

车　琳

(北京外国语大学 法语系,北京 100089)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散文较晚进入法国汉学研究视野,终于在 20 世纪取得翻译和研究领域的突破。从马古烈、徐仲年到班文干等当代学者,唐宋散文逐渐引起重视,出现在他们编纂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和文学选集当中。受到中国国内学术传统的影响,法国汉学界对唐宋散文的翻译和研究同样以古文运动为中心,以唐宋八大家为重点,此外亦有其他一些文人的名篇佳作得以翻译。然而,唐宋散文在法国的译介工作仍然显得零散和薄弱,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与唐诗宋词在法国的普及程度相比,这一时期散文的翻译和研究仍有很大拓展空间,同时,其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也尚未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

关键词:法国汉学;中国文学;唐宋散文;马古礼

中图分类号:G 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6)05-0132-09

唐宋时期,中国古代散文继往开来,得到重大发展。自从明朝朱右、唐顺之、茅坤承等人推崇唐宋八大家以来,其余响犹至今日。法国汉学界对中国散文的研究自然受到中国国内学术传统的影响,因此,对唐宋散文的翻译和研究仍然以八大家为重点。

一、韩、柳相提并论:古文运动奠声誉

较早翻译唐宋八大家散文作品的是曾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图书馆馆长的俄罗斯裔法国汉学家马古礼(Georges Margouliès)。他在《中国古文选》(1925 年)中收入了韩愈的《原道》《师说》《进学解》等 16 篇作品①,大多选自《古文观止》,最引起他关注的是韩愈在唐宋时期古文运动中的作用:"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重要转折。"②同时,马古礼认为不要只以一人殊荣而忽视了古文运动的先声,他在介绍六朝文赋同时存在骈俪和质朴两种风格时便已提到古文与今文的概念及区别③,继而有陈子昂等初唐文人揭橥复古的旗帜,韩愈提倡古文运动无非是"顺势而发"④,主要是成熟的时机造就了他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对于其才华和影响不必贬低但是也不必过分褒扬。"在世之时,韩愈的文章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直到身后两个世纪方才得到同一流派文人的重新发现,继而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说韩愈被誉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因为他的文章确实成为这一流派的典范并最完备地体现了其特色。"⑤在《中国文学史(散文卷)》(1948 年)中,马古礼称赞韩愈是古文、散体文和骈文的集大成者,而古文影响最大,他的功

收稿日期:2016-05-16

作者简介:车琳,女,安徽芜湖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受北京外国语大学基本科研业务经费和卓越人才计划资助,项目名称为"中国古典文学 20 世纪在法国的传播与影响"(项目编号:15020011)。

① Georges Margouliès, *Le Kou-wen chinois. Recueil de textes avec introduction et notes*,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25, pp. 177-219.

② Georges Margouliè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rose*, Paris: Payot, 1949, p. 186.

③ Cf. Georges Margouliè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rose*, *op. cit.* p. 134.

④ *Ibid.* p. 152.

⑤ *Ibid.* p. 153.

劳在于使诗歌与散文有了分野,在当时追求绮丽的风气中提出把文章的教化作用置于艺术追求之上,其文学才华体现于一种不事雕琢的典雅。①马古礼同时分析了韩愈散文中的两个阙失:其一,中国文人作品中常见的山水主题在其作品中并不突出,他关注更多的人事而不是自然风物;其二,作品诗意不足,这是由于韩愈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不过他的文章因此而富有慷慨之力。在主题研究上,马古礼敏感地发现韩愈的一些文章中表现了文人的落魄生活,而这一题材在其他中国文人的作品并不多见,他们或是避之不提,或是抱着一种安贫乐道的心态,而不像韩愈这样对贫贱文人或下级官吏的艰难生活直言不讳。②马古礼还指出韩愈思想上的偏激之处:作为一个纯粹的儒家弟子,他一心复兴儒学,因此对所处时代佛道流行的现象表现出强烈的排斥和批判,《原道》便是一例。③总体而言,马古礼对韩愈其人其文的评价不乏中肯的意见。

20 世纪上半叶留学法国的中国学者徐仲年(Hsu Sung-Nien)1932 年在巴黎以法文编纂出版《中国古今文选》,在书中介绍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不仅是诗人而且也是伟大的散文家,并翻译了《原道》《原性》和《论佛骨表》三篇作品。由于徐仲年在文选中并没有设立散文这一体裁,这三篇论说文都被安排在哲学作品类别中。关于这些作品的思想性,徐仲年指出,韩愈“并不真正了解老子的道家学说,他的《原道》一文并没有体现深刻的思想,而《原性》一文不过是孔子学说的概括”。他“生活在一个尊佛向道的时代,却坚持将儒家思想奉为圭臬”,所以“勇敢地撰写了《论佛骨表》一文劝谏皇上不要迎请佛骨入京”。徐仲年还从文笔角度称赞该文“虽然文字简朴,但是行文有力,具有古雅之风,兼有由衷而发的悲慨之情,是一篇真正的散文杰作”。④

中国文学教授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在《中国文学史》(1989 年)中用重要篇幅介绍了韩愈:“韩愈和柳宗元发起了古文运动,反对前朝盛行的讲究排偶、辞藻、华而不实的骈文,提倡质朴自由和有利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章传统,但并不亦步亦趋。”⑤班文干在简要回顾韩愈的政治生涯之后,主要结合论说文阐述其文学思想。他首先援引了《原道》开篇中“博爱之谓仁”等文句来说明韩愈复兴儒家思想、提倡文以载道的主张,即学习先秦两汉古文,遵从社会伦理,方能有平和之心和质朴之文。“韩愈反对佛道,强调儒家学说。他知道这不仅需要从思想上而且需要从语言上进行斗争”⑥,故而提倡回到有利于表达思想的古朴文风。班文干认为韩愈的一些文章颇有抨击色彩,引用《论佛骨表》中文字说明其“尊儒反佛”的思想,而《师说》抨击了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祭鳄鱼文》这篇“檄文”格外引起班文干的兴趣:“韩愈作为潮州刺史,戏仿了鞭笞强贼的政令文(其实是隐射此类政令的无效),以恩威并用的语气劝戒鳄鱼迁离当地恶溪之水。”他尤其发现韩愈在此文中“不乏幽默色彩”⑦。此外,班文干也注意到韩愈散文中的抒情作品,并评价道:“这位以文传道的文人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由兄嫂抚养成人,与其侄自幼相守,感情深厚。在其病亡之际,韩愈写下的哀悼文字便是例证。”《祭十二郎文》令班文干感触颇深,他在著作中用整整一页翻译了其中的重要段落,并对其文字风格大加赞赏:“韩愈摈弃他所处时代追求绮丽的文风,行文自然,质朴的情感仍然能够感动今天的读者。”⑧班文干认为同样感人至深的还有《马说》,在《中国文学史》中

① *Ibid.* p. 186.
② *Ibid.* p. 190.
③ *Ibid.* p. 187 – 189.
④ Hsu Sung-Nien, *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Paris, Librairie Delagrave, Collection Pallas, 1932, p. 38, 504 – 506.
⑤ Jacques Pimpaneau,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prose*, *op. cit.* p. 256.
⑥ *Ibid.* p. 258.
⑦ *Ibid.* p. 259.
⑧ *Ibid.* p. 259.

全文翻译了这篇短文,还译出《送穷文》并收入《中国古代文选》(2004年)中。

综上所述,法国汉学界对韩愈散文的翻译和介绍基本上散见于中国文学史著作和文学选集当中,其代表作大多得以 译,翻译最多的当属《原道》一篇。尽管他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和散文风格都得到充分介绍,但是关于韩愈的专门性研究尚未出现。

与韩愈并称"韩柳"的柳宗元散文成就卓越。马古礼发现柳宗元的文多于诗,散文是其创作重心,赞扬其散文品类的多样性,翻译过《驳复雠议》《桐叶封弟辨》《捕蛇者说》《愚溪诗序》《小石城山记》5篇。① 他对柳宗元散文的研究文字几乎完全建立在韩柳二人的比较研究基础上。"韩愈,作为流派掌门人,他的职责是破旧立新,树立主张;而柳宗元则在艺术化方向上进行了更多的努力,他的作品比韩愈的作品更具艺术性,无论是在叙事体、论说体还是描摹状物方面都提供了将新文学主张应用于创作的典范,相比于韩愈熟练而平淡的文章,柳宗元在艺术价值上进一步确立了古文运动的地位,他在新的文体风格中注入了更多的灵动和流畅。"②为了便于法国读者进一步了解柳宗元与韩愈的创作风格异同,马古礼还以法国文艺复兴时期龙沙(Pierre de Ronsard)与杜贝莱(Joachim Du Bellay)这两位文人在七星诗社中的不同作用来加以类比。可以说,马古礼对柳文更加欣赏,认为他的作品不仅具有古文运动所提倡的质朴清晰等特点,而且在语言节奏和气势上更加精妙,尤其是文中的描写虽不事奢华却依然形象典雅。马古礼还认为柳文经常包含深邃的哲学思想,并对其矛盾性进行了简短评述:他有时表现出明显的怀疑主义,例如著名的《天说》一文表现出对天意主宰的质疑,有时又产生一种佛教神秘主义倾向。③总而言之,马古礼对于柳宗元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哲理性、语言的音乐性、对自然万物的描摹和诗性描写,这些特征对于开展古文运动极为有益,表明他们所提倡的文体可以以它特有的诗意方式将精微的思想、丰富的情感完美地表达出来,并不妨碍文学创作的艺术性。不要忘记,我们在柳宗元身上所发现的这些优点——深邃的哲思和诗意的画面——正是所有中国艺术作品的主要特质。它们在柳宗元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但是在韩愈身上则了然无几。"④不过,马古礼紧接着又为韩愈开脱: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发轫者,唯恐华而不实的文风卷土重来,因此坚决抛弃与之对立的一切元素,故而其文平实有余却优美不足;而柳宗元已无此忧,只需将古文主张应用于创作实践,故而敢于在新的文风中重新恢复文学作品固有的唯美元素,将二者融会贯通,因此其文婉深有致。

班文干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基于大量的作品翻译,他的研究可能也参考了一些20世纪中国学者的成果。他对柳宗元的评价较为中肯:"柳宗元仰慕《史记》和《汉书》,也写了一些具有传记色彩的作品,有的近似唐朝流行的传奇,而且他的故事短章具有寓言性质。山水文章表现了在自然中的感悟。"⑤他认为柳宗元的文章"比韩愈更多了几分愤世嫉俗、辛辣讽刺和理性"⑥,尤其是代表性寓言作品《三戒》最能体现针砭时弊的特点。班文干节译了不为人熟知的《临江之麋》和《永某氏之鼠》两则以及序言。在《中国古代散文选》中,班文干则选译了《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和《河间传》三篇作为法国大学中文系学生的阅读材料;《天说》《封建论》和《乞巧文》得以翻译和选录到《中国古代文选》中。在思想性方面,班文干认为柳宗元继承了儒家思想,并在《中国文学史》中引用《小石城山记》的最后一段"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来说明柳宗元的怀疑论思想。班文干虽然未就此展开讨论,但是他从这篇山水短文中洞察到柳宗元对唯心主义天命论的

① Georges Margouliès, *Le Kou-wen chinois. Recueil de textes avec introduction et notes*, *op. cit.*, p. 220-230.
② Georges Margouliè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prose*, *op. cit.*, p. 190-191.
③ Cf. Georges Margouliè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prose*, *op. cit.*, p. 196.
④ Georges Margouliè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prose*, *op. cit.*, p. 196.
⑤ Jacques Pimpaneau, *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lassique*, Paris : 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 2004, p. 354.
⑥ Jacques Pimpaneau,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Arles : Philippe Picquier, 1989, p. 261.

质疑,同时也认为他的思想受到佛、道的影响。①关于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主张,班文干指出,他提出回到简洁有力的文风,更加重视表达的内容,但是这并不是说不注重文辞的表达艺术,他既反对"文而无质",也反对"质而无文",而是追求"文以明道"。②

二、欧阳修的译介:文学散文与史论散文并重

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在北宋中期的文坛上占有崇高的地位,是诗文革新的领袖。这一点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可。徐仲年在《中国古今文选》中称欧阳修为"宋朝最杰出的文学大师",他发现和提携了诸多年轻才俊,他们当中的苏氏父子、王安石、曾巩、梅尧臣等人都是北宋文学的中坚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得益于欧阳修,宋朝才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他评价欧阳修本人的散文风格"具有古风的质朴流畅,而且毫无迂腐做作之气",而且"欧阳修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我毫不犹豫地将其置于班固之上"。③ 徐仲年节译了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里的名篇《伶官传》中后唐庄宗耽溺俳优而身死国灭的片段,选入文选中第五部分"历史著作"。④顺便一提的是法国当代汉学家蓝克利(Christian Lamouroux)于 1997 年发表的《前事之师,后车之鉴:读欧阳修(1007 – 1072)历史著作有感》⑤。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主要研究了欧阳修在《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中体现出来的历史观,即重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前代历史为当今治世之鉴,治国之道当从前代的秩序和混乱中汲取教训。蓝克利的研究角度虽然与文学无关,但这是我们发现的关于欧阳修的唯一一篇专题研究。

同样,马古礼在介绍欧阳修时首先称赞了他在《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中的史学成就,并将之与班固相提并论:"无论是从详细而精确的结构安排还是从精致优雅的语言表述来看,欧阳修都步法班固之《汉书》,而且是班固当之无愧的继承者。"⑥欧阳修的传世文章达两千余篇,书信、政论、史论、序跋、叙事、抒情等各体兼备,马古礼对其丰富的散文创作产生深刻印象并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清点:首先,欧阳修是古文运动后书信创作最多的作家,超过 500 余篇;墓铭碑状文字百余篇;论说文有 30 余篇,虽然数量不是最多,但是其中很多篇流传甚广;收入文选的公文有 150 多篇。⑦由于马古礼当时所掌握的资料有限,他的统计未必准确,尤其是在公文这一类别,因为我们知道欧阳修写作公文逾千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不过,马古礼强调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文人们已经倾向于把实用公文写作与文学性散文区分开来,有大量公文没有被纳入文学作品选集中。马古礼还注意到欧阳修的风景散文体现了对自然事物的关注,山林鸟虫、田园风光经常出现在他的文字中;同时,在论说文中,他"长于说理,逻辑严密,甚至不乏激烈和犀利","谋篇立意无可挑剔,立场坚定,用语精当,他呈给皇帝的谏文和与王安石的书信都体现了这些特点"。⑧关于欧阳修的文体,马古礼承认其散文的艺术品格,而且认为于平易中追求雅致更为不易:欧阳修的文章尽管"偶尔难免疏忽",但是总体而言,"能于平易自然中追求婉曲有致,更增添作品的诗意和魅力",且文辞"纡徐委备""声韵和谐",而一般的文人往往只能在平易中流于平淡。⑨可见,马古礼虽然很少论及欧阳修的具体作品,但是对其文学成就以及艺术

---

① Jacques Pimpaneau, *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lassique*, *op. cit.*, p. 354.

② *Ibid.*, p. 353.

③ Hsu Sung-Nien, *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op. cit.*, p. 46.

④ *Ibid.* p. 431.

⑤ Christian Lamouroux, Entre symptôme et précédent : notes sur l'œuvre historique de Ouyang Xiu (1007 – 1072)), *Extrême-Orient*, *Extrême – Occident*, vol. 19 (La Valeur de l'exemple. Perspectives chinoises), 1997, pp. 45 – 72.

⑥ Georges Margouliè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prose*, *op. cit.* p. 214.

⑦ Cf. Georges Margouliè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prose*, *op. cit.* pp. 214 – 215.

⑧ *Ibid.* p. 220.

⑨ *Ibid.* pp. 219 – 220.

风格的把握颇为确切。此外,他在《中国古文选》中翻译收录了《朋党论》《纵囚论》《醉翁亭记》等八篇散文。①

班文干认为自唐以来的"古文运动到欧阳修的时候终于得以确立,骈俪文不再是文章的主流"②,这是对欧阳修在诗文革新运动中承前启后作用的高度评价。至于欧阳修的散文风格,班文干则以"平易婉转"来形容。他还指出,西方读者不必受自身文化影响,把这些推崇朴素古道的中国古代文人想象成缺乏生活情趣的老古板,欧阳修就曾写过著名的《醉翁亭记》,表达在山林中游赏宴饮的乐趣。班文干的主要贡献体现于作品的翻译,他精心选译了《朋党论》《送徐无党南归序》《释秘演诗集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卖油翁》等名篇,包含了政论、序文、书信、游记、寓言故事等多种体裁,收入《中国古代文选》中。③此外,皮埃尔·布里艾尔(Pierre Brière)翻译了欧阳修的《秋声赋》《祭石曼卿文》《梅圣俞诗集序》《纵囚论》《洛阳牡丹记》片段等共 12 篇散文,1997 年以《辩诬堂及其他》④为题在法国北方一不知名的出版社结集出版,共印行 200 余册,欧阳修因此成为唐宋八大家中有个人作品选集在法国出版的第一人。

三、苏氏父子译介:苏轼独领风骚

继欧阳修之后,宋代三苏在文坛占据重要地位。苏洵擅长散文,马古礼译有《六国论》和《管仲论》⑤,但对作品没有进行具体研究,只是对其散文的整体风格有所论述。国内学者通常认为苏洵的学术渊源来自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思想,马古礼也明确指出苏洵常以《战国策》为阅读经典和写作典范,因此他尤擅史论和政论,其文章风格也脱胎于之,结构缜密,说理周详,纵横恣肆,且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但是,马古礼也认为,苏洵的散文在论点鲜明的同时喜欢"以气御文,难免将个人好恶强加于读者,令人不能完全苟同"。⑥

苏轼之名胜于其父。马古礼认为,"欧阳修的散文成就高于诗歌,而苏轼诗名更高,但是他的散文创作仍然丰硕,可与欧阳修相提并论,成为宋朝中期最重要的散文家和文坛领袖"。苏轼"乐于吸收自古至今优秀作家的文体优点,无论是上古周朝的文字还是同代曾经提携过他的文人领袖欧阳修,他都怀有景仰之心"。然而,马古礼对于苏轼睥睨六朝之文颇有微词,认为他为了歌颂韩愈的古文运动功绩而赞同其否定六朝诗文的态度是不可取的,"韩愈之言可以理解,因为出于论战需要而往往言辞激烈;而苏轼的轻率态度则令人不解"。不仅如此,马古礼还写道:"无论从气质还是才华而言,苏轼都无限接近于陶渊明或谢灵运一类文人,而非韩愈等唐代作家。"⑦

马古礼翻译过苏轼《贾谊论》、《喜雨亭记》、《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潮州韩文公》等 10 篇散文⑧,注意到各类体裁在苏轼文集中均有体现。显然,马古礼对于苏轼的论说文无多好评,认为他的史论文章往往"立意偏颇","为了说理周详而不能将古人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加以审视,他一方面执着于个人观念,一方面不了解真实的政治生活,因此将一切与其个人原则相悖的言行都以罪论之"。马古礼在苏轼文集中没有发现祭悼文,而且认为他的散文"虽然充满飘逸、诗意和哲理但是很少流露个人情绪",并由此展开了对苏轼的性格及思想的讨论。首先,他认为这说明苏轼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不似其他文人多流于人之常情,并且推断这可能受到父亲苏洵

① Georges Margouliès, *Le Kou-wen chinois. Recueil de textes avec introduction et notes*, *op. cit.*, pp. 245 – 262.

② Jacques Pimpaneau,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op. cit.*, p. 264.

③ Jacques Pimpaneau, *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lassique*, *op. cit.*, pp. 376 – 385.

④ Ouyang Xiu, *La Salle du Discernement du Vrai et du Faux et autres textes*, traduit par Pierre Brière, Saint Quentin : Cazimi, 1997.

⑤ Georges Margouliès, *Le Kou – wen chinois. Recueil de textes avec introduction et notes*, *op. cit.*, pp. 263 – 270.

⑥ Cf. Georges Margouliè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prose*, *op. cit.* p. 225.

⑦ *Ibid.* pp. 227 – 229.

⑧ Georges Margouliès, *Le Kou – wen chinois. Recueil de textes avec introduction et notes*, *op. cit.*, p. 271 – 298.

性格遗传,或是受到所读《战国策》中政客形象的影响;继而,马古礼可能自己意识到这种臆测过于主观,所以更倾向于从苏轼的道家思想上寻找原因,马古礼还列举了苏轼的两篇文章借以说明:其一是《超然台记》有曰“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和“物非有大小”,故而事物的重要性乃人之赋予,而快乐的秘籍则在于懂得超然事物之外;其二是《赤壁赋》中苏轼通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表达了将短暂的人生融于无限的自然以达至永恒的心境。总而言之,在马古礼看来,可能正是苏轼本人庄禅旷达的生活态度使他不轻易表达悼逝之情。①其实,苏轼之文虽有略情之处,但是马古礼亦有失察,例如苏轼在《祭文与可文》中哀悼以画竹闻名的好友文同,情真意切,悲恸之情溢于言表;半年后,他又写作了《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深情追忆故友,见画中竹“废卷而哭失声”。笔者认为,苏轼的散文记事抒情,处处可见真性情,可能是因为文中常常合景存情且含蓄深沉,其中蕴藉的情感不易于被一个外国汉学家所体悟。

相比于论述文而言,马古礼对苏轼的山水游记更有兴趣,并在评论中经常将之与欧阳修的写景文章进行对比。自然描写虽在二者的文章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他们描绘自然的方式不尽相同。欧阳修常“以宁静之心凝视自然,摹山范水,并寻求融身于美景之中”;苏轼则“出于浪漫的气质和高邈的哲思而乐于寻找不平常的自然之景,例如他喜欢捕捉月色下变幻的景致,并且运用奇特的比喻更加突出它的奇妙怪诞”。马古礼捕捉到东坡笔下不同寻常的自然姿态,可谓观察细致、了解深入。他还援引《昆阳城赋》为例,该文描写了昆阳故城遗迹,千年之前的昆阳之战场面被苏轼点化为“兀若驱云而拥海”“虎豹杂沓而横溃”,确实是翻空出奇,充满奇幻的想象。“苏轼经常竭尽能事营造突兀离奇之意境,这是因为他认为事物充满变化性并且具有非现实性。”②

马古礼对自汉以来的赋体流变有深入研究,故读东坡赋最有心得。他发现“苏轼作赋不分古体近体”,也就是说,古体赋和近体赋的特点都存在于他的赋文创作中。流传后世的东坡赋有二十多首,马古礼对它们进行了划分,并认为古体赋居多,而近体赋只有两首,即《滟滪堆赋》和《天庆观乳泉赋》。在古体赋风格中仍然可以区别出不同形式,例如《屈原庙赋》中虽“诗句长短不一,但大多以‘兮’字收尾,形似宋玉之赋”,也就是说这是一首接近楚辞体的赋文。《服胡麻赋》附有具梦幻色彩的“奇特序言”,“叙事风格颇似《赤壁赋》和《黠鼠赋》”,而且“行文自由,但是每句皆以‘兮’字结束。这种无论奇数句偶数句都以‘兮’字终了的特点少见于赋,更多见于‘骚’”。马古礼发现有几首苏轼赋“韵律整饬,具有六朝辞赋的风格,而锻字选词则接近古风,古今相宜得彰”。在苏轼的赋文中,马古礼认为有一类颇具共性,它们以对话的形式引入议论,而东坡居士本人正是赋文中主要发表意见者,“特征最为明显的便是《秋阳赋》,它与宋玉的《风赋》结构类似,又与欧阳修的《秋声赋》声气相通”。由此论断可见马古礼对中国历代文赋研究之深,时时在类比中考察脉络演变和因承关联。他并不止于表面的比附,还能见异于同:“当然,由于语言变化的自然结果,《秋阳赋》的语言表达和总体格调不及宋玉《风赋》和汉赋意境高远和情感崇高,苏轼之赋常常格调不拘,轻松随意。”此外,马古礼还提到苏轼的《黠鼠赋》与欧阳修同名之作的互文关系,《后赤壁赋》中的景色描写,而这种“在景色中阐发哲理的写作手法……与他所崇拜的庄子的文字有几分相似”。最后,马古礼对于东坡赋总体上给予较高评价:“在这些作品中,他善于将赋这种文体与韩愈古文运动以来形成的散文化语言风格完美地契合在一起,东坡赋的艺术风格是看似构思散淡随意,实则增添了作品的魅力。”③。

苏轼的散文同样得到班文干先生的重视,在《中国古代散文选》中,他选录了《李氏山房藏书记》和《留侯论》两个名篇。在《中国古代文选》中,他又选译了另外 9 篇,分别是:《答秦太虚书》

---

① Cf. Georges Margouliè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prose*, *op. cit.*, p. 229 – 231.

② *Ibid.* p. 233.

③ *Ibid.* p. 233.

和《答李端叔书》两篇书信体散文,《赤壁赋》和《后赤壁赋》,短文《记承天寺夜游》,寓言散文《程氏爱鸟》,哲理散文《日喻》,《净因院画记》和《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两篇画论。从篇目选择上看,班文干尽量涉及了不同题材的东坡散文,而且大多数译文之前都有一小段简介,或介绍写作背景或介绍文章主题;从篇目数量上看,苏轼也是入选《中国古代文选》散文篇目最多的作家。2003年,班文干还将所译苏轼散文名篇以《自述》为题结集出版①,2010 年,宋代文学和思想研究专家斯特凡·傅亚(Stéphane Feuillas)整理和翻译了苏轼的六十余篇碑铭文,结集出版。②译者认为苏轼在这种特殊的中国古代文学体裁中既尊重了官方命题文学的局限,又在主题上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创作的可能性,突破了碑铭文平淡无味的固有缺陷,融入对自然风物的描绘和对世道人生的冥思,充分展现了文学才华。这本近 600 页的苏轼选集不仅译文流畅优美,而且在选题方式上也将为法国汉学家译介中国古代经典作家提供新的思路。借助以上两部单行本译著的出版,苏轼可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中在法国流传度最广的大家。

关于苏氏父子三人,徐仲年在《中国古今文选》中的简单评价基本代表了中国学者的观点:“苏洵以博学著称,苏轼的文学声誉最高,而苏辙则在父兄之后相对受到冷落。”③除了马古礼所译一篇《六国论》发表于 1925 年④,苏辙的散文作品尚未进入法国汉学界的翻译和研究视野。

四、曾巩、王安石:他乡难遇故知

在国内,唐宋八大家中的曾巩在明清时期曾受到文人的高度赞扬,但是在 20 世纪的学术界则未受重视。同样,曾巩也很少出现在法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野中。徐仲年的《中国古今文选》对其只有一次提及:“曾巩是一个注重循规蹈矩的道学家,但是文才平庸,缺乏突破陈规的独创性,其文颇似枯燥无味缺乏起伏的平原。”⑤此言固然偏激,倒也反映了大家公认的曾文略少情致的缺憾。然而,马古礼却另有见解:“曾巩传世作品数量不多,文风平实朴质,没有任何修饰和造作,直接表达一个朴素清晰的思想,完全通过精选文眼和锻词炼句来产生文韵。”须知马古礼在研究中国古代散文的过程中一向偏爱形象性和抒情性散文,却对文风质朴的曾巩散文评价颇高:“曾巩并不像司马光那样刻意追求言简意赅,他的文章本身短小精练,因为遣词造句都极为朴实自然,看似毫无特色,却不失为精品。它们表面平易,实际内敛蕴藉,非一般作者所能至。”马古礼此语超过了他对韩愈之文的评价,并且他对曾巩的欣赏并非空洞敷衍之言,而是建立在对作品入微体察的基础上,例如他特别注意到曾巩文中对文言虚词中的连词有独具匠心的使用:“大多数中国文人在一句话中把连词作凑数之用,并无实际意义,而曾巩则能够将之用来起承转合,统领词句。”关于曾巩作品的思想性,马古礼自然也观察到其“醇于儒”的特点,因而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持抨击之态,不过他的立场不似韩愈那样激烈,而依然保持其固有的冷静平和,略施嘲讽,《鹅湖院佛殿记》一文便是此类“平淡中见犀利”杂文中的代表作。⑥由上可见,马古礼对曾巩的研究虽然没有长篇大论,但是他能透过曾文表面的平易看到内潜的气质与底蕴,比 20 世纪中国学者给予曾巩的评价更高。在《中国古文选》中,马古礼选译了《寄欧阳舍人书》一篇。⑦此后,直到 2004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选》,方有曾巩一篇《墨池记》被班文干先生翻译到法文。⑧

---

① Su Dongpo, *Sur moi-même*, trad. par Jacques Pimpaneau, Philippe Picquier, Arles, 2003, p.196.

② Su Shi, *Commémorations*, texte établi, traduit et annoté par Stéphane Feuilla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coll. Bibliothèque chinoise, 2010, p.591.

③ Hsu Sung-Nien, *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op. cit.*, p.46.

④ Georges Margouliès, *Le Kou – wen chinois. Recueil de textes avec introduction et notes*, *op. cit.*, pp. 299 – 301.

⑤ Hsu Sung – Nien, *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op. cit.*, p.46.

⑥ Georges Margouliè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prose*, *op. cit.*, pp.221 – 222.

⑦ Georges Margouliès, *Le Kou – wen chinois. Recueil de textes avec introduction et notes*, *op. cit.*, pp. 302 – 305.

⑧ Jacques Pimpaneau, *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lassique*, *op. cit.*, p.375.

无论在政事还是诗文领域，王安石比同侪友人曾巩更负盛名，他在国内得到更多研究，被认为是文学成就卓著的一代名相，然而他的散文在法国同样很少得到研究关注。徐仲年的《中国古今文选》并没有选录王安石的散文篇目，除了介绍他致力变法的经历之外，只提及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并以“王安石笔力雄健和倨倔刚毅的文字一如其人”①一言带过。马古礼译有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同学一首别子固》两篇文章②，不过对其散文创作的评价不比曾巩散文更高，而且仅有一段评论文字。首先，他肯定了王安石的散文成就：“王安石数量众多的作品中优点显而易见。与曾巩一样，他时常以看似简单实则经过精心推敲的语句来产生强烈效果。”在下文中，他对王安石文章的点评体现了一种辩证的态度，因为一个特点既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第一，王文给人一种“博学强识”的印象，但是“其中各种成分往往没有完全融会贯通形成统一，因此难免有拼凑之嫌”；第二，马古礼认为王安石的文章“情韵不足”，不过“在一些能够触动他的主题上便会一改冷峻的面孔，比如在涉及变法的议论中，他总是表现出一个政治斗士刚毅果敢、气势磅礴的精神面貌”。③总体而言，可能是因为王安石的文章长于说理而庄厉峭刻，故而给马古礼造成艺术感染力较弱的感觉。同时，这也说明马古礼作为一名西方学者，在评价中国作家作品时并不完全依据发源国学术意见的影响，而是经常保持自己独立的视角和态度。

马古礼在《中国文学史（散文卷）》中对于唐宋古文运动给予以下总体评价：“由韩愈和柳宗元发轫，在公元10世纪得以普及和发展，古文运动在11世纪的文人笔下终于达到后世难以企及的完美。从12世纪开始，中国人开始标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七大古文派散文家。以历史学家著称的司马光不在其列，而之后王安石被增列其中，史称‘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章流传甚广，至今享有盛名，代表了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也是中国唐宋时期文学的主流。”④而在法国，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所得到的译介和研究相对充分，而其他四家的翻译研究则比较薄弱。

五、其他名家名篇：译作胜于研究

自八大家之后，马古礼在《中国文学史（散文卷）》中述及的宋代散文家还有三位。首先是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他是一个多产作家，创作了大量诗文，散文以诔词、散记和长篇政论为主要形式。”之所以介绍叶适，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流传较广，而且因为马古礼认为“他的散文的优点和缺点都能体现这一时期中国散文创作的特点”，即文字风格“简洁流畅而不失高雅”，马古礼发现其60多篇文章中时常出现四六对偶句式，颇似六朝遗风，同时又保持古文运动以来清晰明畅的文风；但是同时也存在理气浊重之不足。

马古礼善于把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置于相应的历史时期中进行考察，他对南宋时期的政治动荡有所关注，而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便是诗文词曲各体皆工的元好问。马古礼认为他的文风更加接近韩愈和曾巩，只在《叶县中岳庙记》等少数篇章的风物描写中效仿柳宗元，尤其是这一篇与柳宗元的《石头城记》最为相似。“元好问的散文中诗意不足，作为北方文人，他并不着力于自然风景描写，但是他擅长叙述，《济南游记》和《东游记略》便是体现了这种叙述风格，简洁而生动。”马古礼还发现元好问所著序跋文和论说文体现了“博学多识和批判精神”，这一类文字不仅“清晰流畅”而且“逻辑缜密，始终伴有道德哲理色彩”。⑤ 马古礼再一次指出南宋末年的文学创作更重哲理，师工有余而灵气不发。正因如此，他将元好问置于二流文人之列，并且认为唐宋八大家之后的文人大多如此。

---

① Hsu Sung – Nien, *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op. cit.*, p. 46.

② Georges Margouliès, *Le Kou – wen chinois. Recueil de textes avec introduction et notes*, *op. cit.*, pp. 306 – 310.

③ Georges Margouliès,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prose*, *op. cit.* pp. 223 – 224.

④ *Ibid.* p. 235.

⑤ *Ibid.* pp. 245 – 247.

最后,马古礼认为南宋末年的爱国将领和著名文人文天祥具备两大优势——“音韵考究”和“极具感染力的情感抒发”,此外,他文风质朴,并“好用历史和文学典故”。总体而言,文天祥更具诗人气质,他的散文成就虽然没有诗歌成就卓著,却是在盛产诗人的宋朝“体现这种呼唤诗兴而作文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①

上述之外,我们所发现唐宋时期被偶尔涉及的散文作品还有马古礼在《中国古文选》中选译的魏征《谏太宗十四疏》、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王勃《滕王阁序》、李白《与韩荆州书》和《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两篇、刘禹锡《陋室铭》、白居易《醉吟先生传》、王禹偁《待漏院记》和《黄冈竹楼记》、范仲淹《岳阳楼记》、李格非《书洛阳名园记后》、司马光《谏院题名记》、周敦颐的《爱莲说》等。此外还有艾梅里(Martine Vallette-Hémery)在《风之形——散文中的中国山水》②中翻译的范仲淹《岳阳楼记》、吴龙翰《黄山纪游》和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的《新城游北山记》,班文干先生在《中国古代文选》中选译的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和周敦颐《爱莲说》。以上名篇佳作的翻译成果足以令人欣慰,不过并未得到更多汉学家们的足够重视和研究兴趣。

总体而言,在 20 世纪,唐宋散文在法国的译介工作在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名篇佳作多有移译,但是仍然显得零散和薄弱,缺乏全面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从译介对象而言,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作品因其在古文运动中的重要影响而得到相对较多关注。从受众分布来看,大多数译介成果仍然局限在少数汉学研究者和一些汉语学习者的范围,与唐诗宋词在法国的普及程度相比,这一时期的散文作品仍有很大翻译和研究空间。③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Tang and Song Prose in France

Che Lin

(*Department of French*,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Early French Sinologists' works mainly focused on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Pre-Qin Literature and Tang poems. Not until the 20th century, the literary prose of the Han, Wei, Jin, Tang, So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began to draw attention from French Sinologists. Now some French Sinologists have become interested in the little-explored land of ancient Chinese prose, and some introductory writings and translations of a few classic masterpieces can help to fill the gap in research. But systematic studies of the creation of prose still leave much to be desired.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ang and Song prose in France, mainly referring to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se*) by Georges Margouliès as well as the works of such contemporary Sinologists as Jean-Pierre Diény and Jacques Pimpaneau.

Key words: French sinology, Chinese literature, Tang and Song prose, Georges Margouliès (马古礼)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Ibid.* pp. 248 – 251.

② Cf. Martine Vallette – Hémery, *Les Formes du vent – Paysages chinois en prose*, Paris, Nyctalope, 1987.

③ 除先秦诸子哲理散文之外,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的散文在法国的译介相对滞后,此为学界共识,但其缘由未有讨论。笔者不揣冒昧,探究原因有二:其一,从艺术性角度而言,与中国古诗相比,在法国读者眼中,形式短小、含义隽永、融合视觉效果和音乐性的中国诗歌提供了与西方分析性语言、思维的一个差异性范例,而中国古代散文在经过翻译之后必然遗失它在母语中尚可保存的节奏和韵律,从形式上已经无法体现原有的艺术特色。其二,从内容上看,对法国读者而言,中国的小说和戏剧以其丰富曲折的故事情节更能反映中国古代的历史社会现实,也更能带来阅读的愉悦;而更注重风景描写、个人观点表达和个人情感抒发的散文显然不能给普通的法国读者带来以上的阅读和审美体验,只有少数汉学家为了完善中国古代文学在法国的学术版图而对中国古代散文进行翻译和介绍。以上两点粗浅的意见愿与方家继续探讨。